

史学研究网

—— 史学理论、史学史、海外中国学史研究

| 首页 | 学术信息 | [史学理论研究](#) | 史学史研究 | 海外中国学史研究 | 海外看中国 | 书窗、书评 | 报道、随笔 | 等等

▶ 您现在的位置: 史学研究网 >> 史学理论研究 >> 史学理论 >> 正文

今天是: 2009

➡ 吴宗国: 材料、问题、假设与历史研究

热

吴宗国: 材料、问题、假设与历史研究

[作者: 吴宗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北京100871) 转贴自: 《史学月刊》2009年第1期, 中国经济史论坛转载 点击进入: teadmin]

材料、问题、假设与历史研究

吴宗国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北京100871)

《史学月刊》2009年第1期

一 历史研究的出发点是什么

材料和问题是历史研究中两个重要的问题, 下面谈谈我在这些方面的一些体会。我想, 要搞清楚这两个问题, 首先要搞清楚历史研究的出发点是什么?

历史研究的出发点是什么, 这似乎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 但是人们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却有着不同的答案。

有人说理论是研究的出发点。上个世纪50年代末就曾经提出过“以论带史”的口号, 现在这个口号虽然受到批判不再有人提起, 但是认为理论是研究的出发点这种观念还是有着广泛的影响。一些年轻人在学习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以后, 往往还没有搞清楚这些理论的来龙去脉, 就匆匆地拿来运用。在运用这些理论时, 更没有把它们看成是研究历史的一种指导原则, 一个观察历史的新的角度, 而是把这些理论当做教条, 作为自己研究的出发点, 仿佛历史研究就是用这些理论把历史事实串连起来, 或者说用历史事实来说明这些理论。又陷入了上个世纪风行一时却给我们民族和学术界造成巨大灾难的教条主义的深渊。

还有人说现实或者现实问题是研究的出发点。上个世纪70年代, 曾经有人提出过“立足现实, 追溯历史”, 那是为了说明他们的政治观点, 用历史事实来为他们的观点做注脚。这就是所谓“影射史学”。这种把问题推向极端的做法虽然在一定时期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但时过境迁, 人们不难发现其中包藏的祸心。但是好心的人们利用历史作为现实斗争的工具, 这样做难道不可以吗?如果仅仅是附会和影射, 作为历史研究是不允许的。根据现实中出现的问题, 客观了解历史上这方面的情况, 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得到某种启发, 这是对历史发展采取负责态度的人们经常想到的。但是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不能有任何成见, 不是从历史上寻找材料为现有的政

治和政策或自己的观点做注脚，而是完全从材料出发，从历史事实出发，首先搞清楚这些问题的实际情况。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说，也就是规定了一个研究的范围和方向，提出了一个研究的切入点。

也有人说问题是研究的出发点。这个提法不像上面两种观点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时代特色，要中性得多。但是这里需要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问题是从哪里来的。

还有人说材料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有学者还提出，“材料即史学”。

这只是其中几种说法。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到底是什么，实在是众说纷纭。

关于历史研究的出发点问题，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翦伯赞教授针对当时弥漫于史学界特别是年轻史学工作者中间的“以论带史”的观点，提出：“研究历史要从实际出发，从具体的史实出发，不能而且不允许从理论出发，从概念出发。一般的理论或概念只是研究历史的指导原则，不是出发点。理论和概念是研究具体史实得出来的结论。如果从理论和概念出发，那岂不是先有结论，然后按照结论去武断历史？岂不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从抽象到抽象。”（翦伯赞：《关于史与论的结合问题》，《光明日报》，1962年2月14日）这是迄今对这个问题的最好回答。

由此可见，理论、现实都不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只有历史事实才是研究的出发点。材料中包含了历史事实。提出材料即史学，强调材料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性，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代，对于历史研究来说，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材料不等于历史事实，因此说材料是研究的出发点也是不合适的。但材料作为记载历史事实的载体，却是我们研究的基础。我们要进行研究，总是从收集材料、阅读材料开始。

二 关于材料的阅读

材料是整个研究的基础，进入收集材料、阅读材料的阶段，才是研究的开始。

为了研究某一个时代的某一个问题，除了了解这个时代的基本情况，阅读一些最基本的材料，重点是要对这个问题的全部的或基本的材料进行系统的阅读。在大量阅读材料的基础上会不断发现各种问题并初步形成新的见解。

在我们阅读材料的过程中，会有一些因素影响我们提出新的问题，形成新的看法。这种影响主要来自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材料本身。我们现在接触到的材料有一些是当时的历史文献，而更多的是当时的和后来的史学著作。

历史文献有它产生的背景，有它们各自的特点。此外就是当代人对当时的历史也不一定就说得清楚，如唐朝的北门学士问题。北门学士分宰相之权，这是《旧唐书》所记载的大家很熟悉的一个说法。《旧唐书》有关唐朝前期的内容，出自唐玄宗时期编撰的《国史》，是唐朝人自己的记载。其实北门学士是帮助皇帝批阅文件，这本来就不是宰相所要做的事情，所以谈不上是分宰相之权。可见唐朝人就已经不是很清楚了。因此，不要盲目迷信当时人的所谓第一手材料，对这些材料也要进行分析。特别是一些反映社会变迁和制度变化的内容，当时人往往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感觉到和认识到的。他们往往是用社会和制度是固定不变的这样一种观点，以原有的社会情况和制度作为一种标准，来评价和记载处于变化过程中的社会和制度。所以，就会有一些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记载。因此，在我们研究的时候，不仅要注意当时人怎么说、怎么写和当时人的观点，更要注意考辨和研究当时的实际情况以及总的发展趋势。只有把握了总的发展趋势，才能正确把握住所研究的对象。

而历史学著作则往往带有著作者的观点和方法，他们的观点和方法往往会影响到历史记载和论述的准确性。他们还往往用当时的情况去理解和论述历史。比方

说，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对于唐朝初年三省体制的描述，主要是以宋代的制度附会唐代制度，其中对“中书出命，门下封驳，尚书执行”的说法是不全面的，特别是对门下省的作用说得很不清楚。还有的作者利用历史来表达他们的观点，因此在材料的收集和对历史事实的考订上都不是很严谨的，断章取义者有之，掐头去尾者有之，以点概面、肆意歪曲也是有的。

由此可见，对材料、对历史文献也必须下一番考辨功夫，拿来就用是不行的。如果我们不加批判地、盲目地以文献材料来作为我们研究的起点，毫无保留地加以使用，那是非常危险的。这些年来我们在隋唐史研究中就有这样一种体会：我们的研究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摆脱宋人种种成说的过程。我们只有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史料出发，从历史真实出发，才能发现新的问题，得出真正科学的结论。

二是现代学者的成说。除了上面所说的历史文献中的成说以外，现代学者的观点，特别是一些权威学者的观点，或被人们尊为大师们的观点，也往往束缚我们提出问题，妨碍我们对材料进行正确的解读，影响我们把研究推向深入。现有的成果是我们进行研究的起点，无疑是不能忽视的。但是我们不能盲目地迷信，哪怕是大师的观点。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并不是因为他们所有的观点都是正确的，也不是说他们所使用的研究方法都是无可非议的。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是因为他们在某些领域或某些方面开风气之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人们有所启迪，对学科发展起了启蒙和推动作用，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学术发展。因此，我们对大师所涉猎过的领域、所研究过的问题、所提出的观点以及在进行这些研究时所使用的的方法，应该采取尊重和学习的态度。但是也要克服敬畏的心理，同样要破除迷信，独立、自由地进行认真的研究，吸取其中合理的和正确的东西，扬弃那些过时的或者不正确的东西。只有我们对现有成果采取正确的态度，我们才能在材料的阅读中发现新的问题，进行新的探索。只有这样做，才符合学术发展的规律。

我们认识任何事物都有一个摸索的过程，对于重大的历史问题尤其是这样。这里首先是材料问题，历史遗留给我们的材料，不论是文献材料，还是考古材料，都是不充分的，越往前越是这样。力图对历史作出清晰的描述，这是每一个历史学者孜孜追求的目标。而在利用这样不充分的材料进行这样的工作时，如果不保持高度的警惕，往往会造成两个后果，一是容易以点概面，二是容易把各个时期的和各种不同的材料加以糅合来进行论述。这样看起来是面面俱到，实际上是真假难辨。特别是在制度的论述上，他们往往是构建了一个虚幻的不存在于这个朝代任何一个时期的制度。

另外，我们了解历史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很多材料，很多历史现象，自古以来史家们都很熟悉，但是由于对当时实际情况和总的发展趋势还没有充分把握，因此实际上并不真正理解它的含义。因此，我们阅读材料的时候，必须在对材料认真考辨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探讨，挖掘出历史事实的真相。

有了一定的学习和研究基础以后，需要进一步扩大阅读的范围。通读某些历史文献是一种可行的方法。有些文献材料如《全唐文》等，篇幅巨大，通读一遍不容易。我们阅读时，首先要提出一些问题，比如注意哪些方面，注意哪些情况。这些问题，一般说都是一些大而化之的问题，它本身不带任何的框框，不具有结论性。这些问题只是告诉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把注意力的重点放在哪些地方。带的问题不妨有几个，不要只限于一个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民间情况、社会变化、制度运作、思想文化等都可以兼顾。有时候甚至可以第一遍阅读的时候注意一些问题，第二遍阅读的时候注意另外一些问题，这样经过几次反复阅读就可以比较全面地掌握相关的材料了。阅读的时候会发现一些问题，产生一些想法，要及时地把它记录下来，可以做成卡片，也可以做成札记。这些材料有的现在用不着，将来可以派上大用场。在我们那个时代，卡片和札记都是抄录手写，这种方法现在仍然可

以使用。至于从电子文本上把需要的材料分门别类拷下来也是可以的，只是一定要与原书进行核对。当然在阅读时只要能够找到原书，还是不要用电子文本。其次，把速读、泛读和精读结合起来。由于唐朝文体的特点，有一部分是可以完全不读的；有些部分可以一目十行地翻一翻，搜索其中有用的材料，找到有用的东西，再仔细阅读；有些部分则需要认真、反复地阅读。对于一些重要的有影响的人物的文章，可以结合他们的文集，系统地加以阅读和研究。例如前期的陈子昂，后期的陆贽、权德舆、韩愈、柳宗元、李德裕、杜牧等。当然在通读过程中不可能全这样做，但是根据需求和可能，选择一两个还是可以做到的。再次，在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需要把几种材料对照起来进行阅读。这是我的一些体会，仅供参考。当年的条件和今天有天壤之别，当时自己既没有书，更没有电子文本，看到今天能有这样的条件，真是感慨万分！

三 关于问题和研究

1. 确定选题

认识和研究一个问题，首先应初步了解有关情况。具体是指初步接触材料，了解前人在这个问题和与之相关问题上的研究，了解相关的资料情报，然后结合本人的情况，如知识、能力、时间和可能查阅到的资料等，考虑是否可以确定选题，也就是所谓的可行性研究。这也是一般所说的开题论证的过程。有些青年朋友在确定选题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举步维艰的情况，这主要是因为上面所说的各项工作还没做到家，或者是想得多看得少，或者是看得多想得少。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第二》，中华书局2006年版）讲的也是这样一个过程。选题是否合适，往往决定研究工作的成败。这确实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

选题确定以后，要进一步总结前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成果，阅读论文和专著。阅读也得有点学问，找到论著以后怎么看，怎么看得快，更重要的是要判断论文的质量，抓住文章的中心，发现其中新的论点和新的材料，使用了一些什么样的研究方法。

2. 问题和假设

提出新的问题，形成新的见解，特别是诸如社会变迁、政治体制变化这样重大的历史问题，那必然是要经过一个艰苦的过程。而进入研究过程以后，有时甚至还要经过几次大的反复，才可能得出比较接近历史实际的比较科学的结论。

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接触到的材料越来越多，便会逐步发现一些新的问题，形成一些新的见解，甚至提出新的概念。但是这些看法还是比较直观的，还只是一种印象，一种初步的概括，也就是假设。

假设在研究过程中是需要的。提出假设是需要胆识的，特别是提出一个不同于前人成说、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假设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当然，对于年轻学者，特别是在校的年轻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来说，由于他们思想上少有束缚，在阅读材料的过程中，凭借直觉，往往会提出一些前人没有提出过的问题。但是由于他们的知识还很有限，研究的功力也还不够，而主要的还是因为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学术界的积累还不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条件还不成熟，因此提出问题后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我就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一位本科同学在准备毕业论文时，提出了关于唐代中书门下与使职差遣的关系问题。当这位同学提出问题后，作为指导老师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让学生自己去摸索，看看这个问题能不能做下去，最后只好不了了之。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学术研究的进展，我的另外两位学生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说明当年这个学生提出问题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在接触了一定的材料以后直观地提出来的，尽管还没有达到假设的程度，但是从认识过程来说，这是很重要也是很宝贵的一步，反映了年轻人思维敏捷的特点。因此，我

们在阅读时出现的一些想法，尤其是那些突发的奇想，往往蕴涵着一个重大问题的突破。我们不要轻易地放弃自己的这些想法，暂时解决不了，可以用札记的形式先保存起来，待将来条件成熟的时候，再继续探索。

提出假设是我们研究过程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但是，对待假设却有不同的理解。

有些学人，甚至有的大师，往往把这种假设看做是研究的终结，接下来的工作便是寻找一些可以附会这个假设的材料，并据此写成论著。这样的著作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随着学术的发展，研究的深入，新的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他们提出的一些见解往往被证明是错误的。因此，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做法。在一些文章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可以认为”、“应该”等一类的提法，这实际上是把一些小的假设作为结论，也是不允许的。

正确的理解是，把假设作为继续研究的方向、线索，一种角度、一个切入点。

怎样把假设变成科学的结论，这是我们整个研究过程中最重要的也是最艰苦的一个环节。

把初步形成的见解或假设变成科学的结论，首先就要从实际出发，广泛、系统地搜集和阅读各种材料。在这个阶段有两项工作是不可缺少的，一是要搞清材料所反映的时间性。历史是处在不断地变动过程之中，具体的材料反映的是特定历史阶段的情况。我们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把这个时期的和另外一个时期的材料简单地揉在一起。有时候，一日之差，往往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二是要对史料进行深入细致的考辨，搞清哪些材料是可信的，哪些材料有问题，也就是要辨别真伪，去伪存真，然后才能根据这些材料进行研究。有时一字之差，也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咬文嚼字的功夫也是不可少的。

在这个研究过程中，考据和分析相结合、定量和定性相结合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

考据不仅在辨别材料真伪的时候需要，在进行研究的时候也是需要的。材料不论是比较少还是比较丰富，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历史事实，其间还有传说、误记和偏见，因此史料不等于历史事实。只有通过考据和分析相结合，才能搞清历史事实的基本情况。有些数据还需要和后来乃至现代的数据相对照，这样才不至于闹出隋代耕地数字比现在还要高出二三倍这样的笑话。

在历史研究中，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是同样重要的。定量和定性，是借来的两个词。这里所说的定量研究，是指对相关材料的充分收集、详细占有和对相关事实的认定，也就是要有充分的论据。定性研究则是指在对材料充分把握和深入研究后所做的结论，也就是对历史事实所做的论述。只有进行了定量研究，定性才可能准确。但是仅仅停留在定量研究上，也是不能取得对事物的深刻认识的。在这一方面，岑仲勉和陈寅恪可以说是两个极端，一位长于定量研究，一位则善于定性研究。

在定量研究中，如果忽略了定性研究，就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往往需要通过收集大量的史料，才能对问题有一定的认识。但是这只能限于那些通过归纳就可以得出结论的问题，对于那些需要经过考证、严密分析才能得出结论的问题，就会显得力不从心，甚至迷失方向。

在定性研究中，如果忽略了定量研究，就容易从印象、理念或某种理论出发而陷入以论带史；就会出现以史料作为自己论点的注脚，甚至偷换概念、瞒天过海等学术研究中不应该出现的现象；就会得出片面的甚至错误的结论。这种情况有时也会出现在一些大师的著作中。

只有扎实地做好这些工作，全面深入地阅读材料，认真细致地进行研究，才能进行最后的理论性的概括，得出科学的结论。这往往是一个从痛苦到欢乐的过程，始则“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继则“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

在灯火阑珊处”。因此，把假设变成科学的结论，除了勇气，还需要有坐冷板凳的功夫，需要很大的毅力和为学术献身的精神。

收稿日期2008—10—30

作者吴宗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 上一篇文章： 卢钟锋：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与中国历史研究
- 下一篇文章： 邓小南：永远的挑战：略谈历史研究中的材料与议题

[【发表评论】](#) [【告诉好友】](#) [【打印】](#)

最新5篇热点文章


- 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在京召开[161]
- 中共为何能在1949获胜:当年美远...[91]
- 访问记：余英时谈好友唐德刚[99]
- 黄现璠先生简历和著述编年目录...[426]
- 唐德刚先生逝世[232]

最新5篇推荐文章

- 《史学研究网》寄语[5559]

相 关 文

没有相关文章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没有任何评论

[| 设为首页](#) | [| 加入收藏](#) | [| 联系站长](#) | [| 友情链接](#) | [| 管理登录](#) |

2004-2007版权所有：史学研究网